



现代的消息

——中国近代文学专题研究

张俊才◎著



现代的消息

——中国近代文学专题研究

张俊才◎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叩问现代的消息：中国近代文学专题研究 / 张俊才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2
ISBN 7-5004-5890-8

I. 叩… II. 张… III. 近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0650 号

策划编辑 冯春凤

责任校对 王 茜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283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前言

叩问现代的消息

我之所以热心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并且一直以“叩问现代的消息”作为自己的学术兴趣，现在回想起来竟是由一种“偶然”的因素促成的。

那还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之初，我为了一个并不崇高的目的，从栖居了十年之久的塞外山城张家口，来到鲁西平原上的聊城，跟随薛绥之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先生是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我的研究方向也自然是鲁迅研究了。记得刚入学时，先生便命我们用半年之力通读《鲁迅全集》，连鲁迅日记也不准落下。正当我和我的同学宋益乔君天天沉醉在鲁迅的世界里，经常为鲁迅的博大精深和举重若轻而击节赞赏时，先生却在出席一次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学术会议后，承担了编选林纾、许地山两位作家研究资料的任务，并把编选林纾资料的具体工作交给了我。于是还是一年级研究生的我便糊里糊涂地与鲁迅研究擦肩而过，一脚踏进了林纾研究这一陌生的领地之中。由于林纾是五四年代所谓的“封建余孽”，晚清、民初那些与林纾相关的原始史料早已被人们视若敝屣，散落、尘封在不同的图书馆里，因此编选他的研究资料确非易事。幸而有先生的鼓励和指导，我用了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走济南、上北京、住天津、下福州，在各大图书馆的故纸堆中寻觅有价值的资料，并向当时都还健在的任访秋、陈子展、钱钟书、郑朝宗、朱

维之等先生以及曾宪辉、连燕堂等同行讨教，终于完成了《林纾研究资料》的编选工作（此书1983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我的学位论文该怎么写呢？那时，近现代文学之间的断代壁垒尚未打破，我为了既能研究林纾又不冒研究对象超出专业范围的风险，便选了《林纾与五四新文学》这个题目。先生对我的这个选题很满意，并认为朝着这个方向做下去，很可能生发出一些新的学术思想。他的意思是不要单纯地为林纾做翻案式的文章，而要借此探讨近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恰在此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又开始讨论文学史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记得好像是王瑶先生率先提出这样的观点：文学史属于历史学科，文学史应揭示文学自身的发展历史，文学史不应该写成作家论的排列。受此影响，我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大谈林纾早年的翻译事业怎样从政治观念、文化意识、文学思想、文学形式、文学语言等方面促进了中国文学的革新，以间接和直接的两种方式加惠于五四新文学。这些见解其实并不多么新鲜，但是在林纾多年来被全盘否定，在近现代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多年来被人们严重忽视的语境下，我以新的思路、新的观念大谈这些问题时还是颇有新意的。这篇硕士论文后来在由河南师大（今河南大学）任访秋、刘增杰、赵明、王文金等先生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严格审评下通过了答辩，它的压缩稿也以《林纾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为题在1983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了。后来，我又用相当多的精力对林纾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是正像我在拙著《林纾评传》（1992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我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林纾的各个方面，但探察林纾对中国文学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所作的贡献，却始终是我最关心的课题。”

一个人在研究生期间形成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思路往往会影响到他的一生，除非他在读研期间根本就没有真正读进去。我在写

完《林纾评传》后又在近代文学这个大的范围内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但不论是对我近代文学学术史的回顾和评述，还是另外一些更为专门的课题的研究，我关注的焦点仍然是近代文学是如何走向“现代”的，换言之，我总是试图在近代文学中“叩问现代的消息”。我和我的师兄徐鹏绪合著的一本阐述近代文学发展进程的书，书名就叫做《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导》（199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兴趣虽然是由一种“偶然”的因素促成的，但正所谓“偶然之中有必然”。因为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它的基本价值概括地说也就主要表现为下述两个方面：其一是它的历史价值或社会价值。它作为民族的心史，不仅反映了我们民族在那个年代里所经受的种种苦难，而且记载了我们民族慷慨悲歌、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其二是它的文学价值或文学史价值。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相比，它自身所具有的过渡性是最为明显的。它不仅继承着传统的精神，更孕育着未来的萌芽。因此，与其说它是古典文学的裹尾，毋宁说它是现代文学的晨光。如是，则“叩问现代的消息”，就成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最应关注的课题之一。

这样一种学术兴趣和学术思路的选取，决定了我对文学的现代性、现代化、历史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性、民族性等话题都格外关注，但回想自己当初这样做起来时，却并没有感到这些话题有多么高妙，它们只不过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思路、一种视角而已。然而，当9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理论输入中国后，“现代性”却成了一个人人争言的“关键词”。我初则以喜：原来中西学术不论有多大差异，总有一些共通的文学现象和共同关心的文学话题，所谓“现代性”我们不也早就关注了吗？继则以忧：因为理论界又有人依据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概念，判定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并不具有现代性，如是则鄙人所叩问的“现代的消息”不都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个人（当然

并不只是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个人”的辛劳全部白费倒不足挂齿，只是现代中国的文学却并不具备现代性，真让人永远坠入五里雾中了。在学术研究中浪费地搬用西方概念已是时髦，且不管它，中国文学毕竟有自身具体的成长环境、发展特点和规律，因此我不后悔自己先前的努力，倘有余力，我仍将在近代文学的研究中“叩问现代的消息”。

本书是根据自己在河北师大中文系开设的“近代文学专题课”的讲稿加工整理而成的。作为专题课，教师的学术兴趣自然可以得到更多的展示，因此我竭力从思潮、小说、散文、戏剧乃至林纾等不同方面去“叩问现代的消息”。作为讲稿，其中不仅有我自己先前发表过的一些论文的影子，而且也尽量借鉴和吸收了近年来近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此次整理和加工时，我又充实了一些新的资料，纠正了一些疏误，并且根据自己现在的认识对全书的结构和部分观点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原稿中还有一章是专论近代诗歌的，但自己觉得写得更不成熟，因此我把它删去了。

在中国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中，近代文学研究至今依然是位陪末座，常常不被人重视。愿以此书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兴旺和发展敲敲边鼓，尽一尽个人的微薄之力！

目 录

代前言——叩问现代的消息	(1)
第一章 思潮篇	(1)
第一节 近代文学思潮演变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1)
第二节 近代文学思潮演变的基本走势和特点	(7)
第三节 经世致用、尊情贵我：近代前期的 文学思潮	(13)
第四节 法欧效日、维新新民：近代后期的 文学思潮	(26)
第五节 “新民”：艰难时世的文学抉择	(42)
第六节 王国维文学思想的现代品格	(55)
第二章 散文篇	(67)
第一节 经世致用散文的崛起	(67)
第二节 早期维新派的散文创作	(78)
第三节 梁启超与“新文体”的勃兴	(89)
第四节 桐城派的“中兴”与凋零	(98)
第五节 近代杂文发展的抽样分析	(114)
第三章 小说篇	(128)
第一节 侠义小说、狭邪小说的变异	(128)

第二节 新小说的崛起及意义	(137)
第三节 李宝嘉与《官场现形记》	(145)
第四节 吴沃尧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151)
第五节 刘鹗与《老残游记》	(157)
第六节 曾朴与《孽海花》	(165)
第七节 鸳泳蝶舞的是与非	(173)
 第四章 戏剧篇	(182)
第一节 近代戏剧改良运动	(182)
第二节 近代传奇杂剧的嬗变	(191)
第三节 近代地方戏的兴盛	(205)
第四节 近代话剧的产生	(218)
第五节 近代戏剧的发展走势	(229)
 第五章 林纾篇	(242)
第一节 林纾的政治思想	(242)
第二节 林纾的诗歌创作	(253)
第三节 林纾的小说创作	(266)
第四节 林纾的古文造诣	(278)
第五节 林纾的翻译思想	(291)
第六节 林纾对现代文学的贡献	(300)
第七节 重评林纾及五四新旧思潮之争	(330)
 参考文献	(347)
 后记	(352)

第一章 思潮篇

第一节 近代文学思潮演变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文学思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文学自身孤立衍生的一种现象。文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是特定社会思潮在文学领域的具体显现。而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群体性、总体性的思想潮流，实际是人们对特定历史现状的共识以及改变这种现状的趋同性思考。因此要从总体上理清近代文学思潮产生的动因，把握其演变方向和意义，就必须了解近代主要的社会思潮以及有关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一 近代社会面临的三大危机

近代社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多事之秋。朝政日非，民生凋敝，内乱不已，外患频仍。提起近代历史，无论是曾经亲临其境的近代国人，还是作为后来者的我们，都不难举出一串串足令壮士扼腕、英雄洒泪的悲事、愤事、丑事、难事！但是，倘若我们能不局限于对每一个灾难孤立的关注和感叹，倘若我们能进而思考造成近代社会一连串灾难的根本之因，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面临的如下三个主要危机：

一是中华民族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咄咄逼人的侵略和压迫。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曾发生过无数次民族矛盾和战争，但矛盾

或战争的双方基本上都属于中华民族的一员。而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主宰的中原王朝在大部分情况下总能依仗着相对发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来化解或解决这种矛盾。即使是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代和清代，汉文化依然是社会的主体文化。因此直到近代以前，中华民族事实上并未真正体味过亡国灭种的痛苦。但近代则不然，中华民族遇到了和自己属于不同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的真真正正的“异族”的侵略。这种侵略既有一般意义上的领土欲求，如沙俄从中国攫取了大片国土，又有更为现实的经济欲求，即从经济上掠夺和奴役中国，变中国为它们的商品市场和殖民地。在近代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背后，又明显地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封建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巨大落差，中华民族处在绝对的弱者地位上。要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就必须反帝反侵略；而要使反帝反侵略不流于空洞的呐喊，就必须发展和改变自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这一切又谈何容易！正因为如此，当近代国人终于懂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时，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总是萦绕在他们心头，像梦魇一样抹不掉，挥不开。

二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机器已丧失了自我调节、自我恢复活力的生命机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一直都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稳定的小农经济结构中，因此封建社会的统治机器总可以通过自身的功能调节如整肃吏治、延揽人才、轻徭薄赋、刺激生产、设立官学、牢笼人心等，克服危机，由衰转盛。这种自我调节、自我恢复活力的政治生命机制不仅使多个封建王朝都曾一度克服了自身的困境而赢来“中兴”，而且也使每个新生的王朝能较快地巩固统治，走向本王朝的“全盛”。但是历史演进到近代，封建社会的统治机器已老化不堪，完全丧失了自我调节、自我恢复活

力的生命机制。究其原因，清代社会承平日久，各种社会病象积重难返固然不应忽视，诚如近代桐城派作家姚莹在其《复管异之书》中所云：“及乎承平日久，生齿日繁而地利不足养，文物盛而干盾不足威，地土广而民心不能靖，奸伪滋而法令不能胜，财用竭而府库不能供，势重于下，权轻于上，官畏其民，人失其业，当此之时，天下病矣，元气大亏，杂症并出，度非一方一药所能愈也。”^①但更主要的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迫使中国封建社会改变了自身的演变轨道，而置身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与国的生存竞争之中。封建社会的统治机器连医治自身的沉疴尚无能为力，更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强敌一比高下。正因为这样，近代一批又一批先知先觉之士一方面按着传统的思维定势，把起衰救敝的希望寄托于清廷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却总是感到失望和绝望。

三是近代中国的国民由于长期受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束缚，其主体部分即广大民众从总体上看依然处在未觉醒的状态中。换言之，近代中国的国民绝大部分并不具备人文意义上的近代国民的素质。鲁迅曾经从“人”的解放和启蒙主义的角度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如下两个不断交替的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②显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所谓国民从未争取到“人”的资格，自然也不可能具有“人”的自觉。封建统治者对待民众的信条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在不断地铸造着一般民众愚昧、守旧、怯懦、盲从、散漫的不良习惯。因此，近代国民尽管处在和他们的先民完全不同的历史年代

① 姚莹：《中复堂全集》，同治六年本。

②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本书下引《鲁迅全集》，均为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里，但他们的精神和性格却依然如同他们的先民一样：对封建专制和权威保持着盲目的敬畏情绪，对救国方略和政治保持着茫然的冷淡情绪，对自身的屈辱和不幸保持着顺驯的忍耐情绪。近代中国面临着反帝反封的艰巨使命，要完成这一使命没有广大民众的自觉参与是万难成功的，但近代民众的绝大多数事实上却无力扮演自己应该扮演的主力军角色。

二 近代三大主要社会思潮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三大危机，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尊严，并谋求自身的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三大难题。基于对现状的这种认识和思考，近代中国依次出现了三大社会思潮。

首先出现的是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以“补天自救”、调节和强化统治机器的生命机制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思潮。显然，这种思潮还极少近代意义的新思维。但在补天自救的思潮中也伴生着对封建秩序的反叛和对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朦胧期待，如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生和早期维新派的出现。而地主阶级改革派“补天自救”的动作中也引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成果，如初级的机器制造业、采矿业、军火业和新式军队的建立等。因此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虽没有越出封建文化的畛域，但近代化/现代化毕竟已在艰难的起步。

接着出现的是光绪年间以维新变法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思潮。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只有一百天的历史，但维新变法思潮却酝酿于运动之前，激荡于运动之后，连清廷顽固派也迫于种种压力不得不在庚子事变后推行一系列“变法自强”的“新政”。这一时期“补天自救”的传统文化心理一变而为“更法变制”的近代文化心理，而更法变制的参照不是虚幻的“康乾盛世”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思潮的鼓荡下，西方资产阶级的

政治、哲学和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科学民主等观念至少在知识群体中已开始得到认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因此而迈出具有实质性的一大步。这一时期以 1905 年同盟会的建立为契机，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也正式兴起，但这一思潮形成普遍性的社会思潮则是下一个时期的事。

最后出现的是宣统及民国初年以反清革命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思潮。这一社会思潮除了主张“共和”反对“立宪”这一点与前一时期的维新变法思潮判然有别外，其他内容大体一致。但暴力夺权和辛亥革命、讨袁护国等一系列艰巨、激烈和残酷的斗争，无疑成为时代最迫切的课题并吸引了革命派的全部注意力，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和文化革命方面并无更为显著的建树，这就使以暴力方式取得的政治革命成果很不彻底。“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启蒙思潮从历史因革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在弥补这一社会思潮注重政治革命而疏于思想革命的缺陷。五四新文化运动自身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使它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完成和现代化起步的辉煌交接点。

三 近代社会思潮中的三个共有文化思潮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存在着三个基本上一以贯之的共有文化思潮：

其一，“主变”文化思潮。《易经》中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被近代不同时期的思想家、改革家反复地引用。补天自救思潮是小变，维新变法思潮是中变，反清革命思潮是大变。总之，不论每个社会思潮的规定目标有何差异，赞成“变”是共通的。

其二，“师夷”文化思潮。自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题后，“师夷”即“向西方学习”便成为近代先知先觉之士强我御敌的基本方略。补天自救思潮“师”的

是西方的“长技”即声光化电、工艺制造之学；维新变法思潮不仅“师夷长技”，而且“师”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文化观念和君民共主的立宪政体；反清革命思潮则又别“师”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和国体。显然，“师夷”思潮在近代不仅一以贯之，而且“师夷”的内容和层次也在不断深化和拓宽。

其三，“新民”文化思潮。应该说补天自救思潮对“新民”的必要性还不够自觉，尽管鸦片战争期间也曾出现一些鼓动民气的诗作。但当“戊戌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维新运动被镇压后，维新变法思潮便把“新民”视为救国之要着，倡导之、宣传之、实践之，成就斐然；反清革命思潮对于“新民”在理论宣传上固有不足，但革命酝酿期间印行的各种反清宣传品，其主旨也是启发民众的民族民主革命觉悟，刷新国民的思想和精神。

上述三种文化思潮自然有各自独立的出发点和内容，但就其反映的士林风尚或学术风气而言，又可以归纳为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思潮。不论是“主变”还是“师夷”或“新民”，要之，其指向都是面对现实，为社会改革服务。在近代这个民族生存危机极为严峻的历史阶段里，无论是宋学的修身养性还是汉学的校勘笺注，自然仍有人沉酣其中，但无不因其鲜少经世致用之旨而成为背时的学问。

以上我们介绍了近代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危机和相应的社会、文化、学术思潮。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把近代文学思潮放在这种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上来考量，我们才能拈出那些符合历史要求、反映时代动向、具有进步性质的切合走向“现代”这一命题的文学思潮来，我们才能历史主义地评判它们的价值，阐释其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导”所独具的意义。

第二节 近代文学思潮演变的基本走势和特点

一 近代主要的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诚然只是社会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文学事业具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列宁语），因此和同属社会思潮组成部分的政治思潮、经济思潮、哲学思潮、文化思潮相比，文学思潮常常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而且人们划分文学思潮的角度和标准也往往不尽一致，例如从文学与传统的关系着眼有拟古主义文学思潮与变古主义文学思潮之分；从文学的阶级性质着眼有地主阶级文学思潮与资产阶级文学思潮之别，在现代还有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等出现；从文学的创作方法和流派着眼又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等不同的命名。近代文学思潮同样既有自身的复杂性，也可以有划分的多样性。例如，近代诗文创作中有许多流派都可以归到拟古主义文学思潮中去，而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又分明表现出通俗文学思潮的特点。为了更有利于我们通过对近代文学思潮的研究来“叩问现代的消息”，为了凸显中国近代文学所具有的“走向现代”这一基本性质，我们将主要从文学与历史进化的关系，文学与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思潮、文化思潮的关系，一句话，从文学与自身乃至整个社会近代化、现代化这一关系着眼，来剔抉并划分近代的文学思潮。这样，近代主要的文学思潮则是以下两个，自然它们也是伴随着历史的进程依次出现的。

第一个是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即近代前期兴起的经世致用、尊情贵我的文学思潮，简言之即经世文学思潮；

第二个是光绪、宣统以至民国初年即近代后期兴起的法欧效日、维新新民的文学思潮，简言之即新民文学思潮。

众所周知，五四时代兴起的鼓吹人道、张扬自我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发难于1917年即民国六年，照理说也是“民初”。实际上从“戊戌”至“五四”是中国文学告别“古典”走向“现代”的一个完整的进程。不谈近代文学思潮的基本内容和走势，五四文学思潮的发生便缺乏具有纵深感的历史背景；不谈五四文学思潮的发生，近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动向和前景自然也不能十分明晰。只是按照目前学术界约定俗成的看法，“五四”已不是所谓近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了，因此，本书对五四文学思潮的论述也只好付诸阙如了。

二 近代文学思潮演变的基本走势

近代文学思潮虽表现出后者取代前者的历史阶段性，但更多的却是表现出后者扬弃、丰富和发展前者的历史继承性。因此，近代文学思潮的演变体现出如下一些基本走势：

其一，面对现实，注目人间。有清一代，文学号称辉煌。但除去清初诗文和传奇《桃花扇》、清中叶的小说《红楼梦》和《聊斋》等外，清代文学从总体上看其成就实在无法高估。其基本缺陷是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萎缩。无论是诗界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还是文界方苞的“义法说”，其基本指向都不出宗经载道之说和纯艺术风貌的探讨。自然这与清王朝强化思想统治，一般文人都抱持“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诗句）的消极避害心理有关。清代理袁枚固然倡导过略具反叛思想的“性灵说”，但袁枚所谓的“性灵”，却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个人的性情、个性。进入近代以后，在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思潮激荡下，文学思潮中便一浪高过一浪地呼唤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灵。在道、咸、同三朝的经世文学思潮中，文学家们一致向往的是“经天纬地之文”。魏源云：“文之用，源于